谢有顺

谢有顺：肯定中国当代文学 需要能力，也需要勇气

“我们永远要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抱以期待”“其实段子手、喜剧人的形象并非余华所愿”“年轻人就应该过漏洞百出、意气风发的人生”“如果你过度迷恋、追求快乐阅读，那你的阅读可能就永远在一个平面滑行，很难有真正的收获”……近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做客羊城晚报音频节目“花地有声”，金句频出。他借由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文学的深意》，谈及当下鲜活的文学现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文学时刻——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熊安娜
图/受访者提供

壹 莫言一定还会写出“惊艳”的作品

羊城晚报：在您的新书《文学的深意》里，点评了很多作家作品，像莫言的《檀香刑》、于坚的散文、李洱的《应物兄》、东西的《回响》等。作为一个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您和很多作家都是好朋友？

谢有顺：我和作家的交往很多，跟他们有广泛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能理解为一种庸俗的关系。在我看来，批评家跟作家的交往，首先是人与人的交往。跟一个人交往，肯定要聊得来、趣味相投，这个交往的价值往往超过了专业层面的往来，并非一定要给对方写评论，没这么庸俗。我的很多作家朋友，我从来没给他写过评论，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羊城晚报：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大家都非常期待他能破除“诺贝尔文学奖”的魔咒，写出比《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檀香刑》更好的作品，您觉得可能吗？

谢有顺：我们永远要对莫言这样的作家抱以期待，他本就不是一个按照常规路径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在不断突破写作常规、突破固有文学秩序。“诺奖”的魔咒也许对很多人都存在，但对莫言来说可能会失效。一方面，他获得“诺奖”时比较年轻；另一方面，他的身上有一种野生的、蓬勃的生命力，一种泥沙俱下、挣脱一切束缚的狂放力量。这种力量尽管在他现在的写作中有所收敛，但莫言的写作始终有自我的深思和变革。等着吧，他一定还会有令我们惊艳的作品。

贰 注视无法被科学量化的瞬间

羊城晚报：现在大家大多是通过综艺节目、短视频等形式认识莫言、余华，这种现代媒体的呈现仿佛离作家很近，但又好像离作品很远。对于这种反差，您怎么看？

谢有顺：新媒体帮助塑造了两位作家的公众影响力。他们幽默、健谈，擅长用年轻人喜欢的语言来表达和描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不过余华之前跟我提到，这种媒体塑造的形象其实“非他所愿”，尽管传播力增加了，但是他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单一的“段子手”“喜剧人”这样的形象。我能理解。毕竟他们的才华、见识和思想深度远非这么一个小片段能够涵盖的。但是两位作家对待网络与媒体没有拒斥，他们试图去理解年轻人，并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亲近年轻朋友们，这是非常好的心态。这种心态会保证一个作家走得更远。

羊城晚报：在新媒体时代，作家与读者的互动增多会对文学现场、作家写作产生影响吗？

谢有顺：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但作家在变化的语境中肯定要有所持守。刚才讲到余华、莫言，他们看起来和时代有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但骨子里、写作上一定有自己一直不变的东西。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影响有时也是积极的，我们不需要过度去焦虑、抗拒。很多人焦虑AI会取代写作，我觉得这种焦虑也为时过早。人工智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取代苏轼写诗，取代曹雪芹写《红楼梦》，取代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我们不用过度夸大这种变化带给人的消极影响，也要认识到它的积极方面。比如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阅读趣味的变化，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

羊城晚报：确实，就像您之前在文章《为不理解、不确定而写作》中也提到，科学、技术都是试图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把一切都变得确定无疑，但是文学告诉我们，世界还有许多不确定和不可理解的方面，自我也像是一个永远不能穷尽的黑洞。

谢有顺：科技和人文是相得益彰的，但也有冲突。冲突带来精神的张力。科学追求数字、准确、客观，这恰恰是文学要反抗的东西。科技越发达，越需要文学。文学告诉我们，人生和世界里还有很多不客观、不准确，在暧昧不清处、在边缘处甚至在黑暗里的东西，正等待被照亮。探索人幽深的内心世界，永远是有价值的。那些注视内心的瞬间，直击事物本质的力量，它们无法被科学量化，却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时刻。

叁 20世纪小说的主角是“内心”

羊城晚报：豆瓣上有一个热门词条叫“文学的时刻”，人们在词条下分享生活中遇到的小片段，或阅读中产生共鸣的一段话。这段话，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文学时刻，给予了他们文学的滋养。您怎么看待这种“文学的时刻”？

谢有顺：我很向往你说的这样一个空间。其实一个人的生命丰不丰富、绵长不绵长，就是看他的人生中的这种时刻和瞬间够不够多。事实上，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无意义中流失，你最后能回忆起来的，往往就是那一些珍贵的时刻和瞬间。也许做很多千篇一律、无意义的事情，就是为了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有意义的时刻，比如一个孩子的诞生，书页间解开多年困惑的一句话，等等。文学，其实就是记录和放大这些时刻和瞬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布满这种时刻和瞬间，绽放着灵光闪烁的东西。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一个瞬间、一个细节能让你记住，那就谈不上是好作品。

羊城晚报：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这种文学的时刻似乎太少了。我们疲于工作，所以向往“诗和远方”。在您看来，年轻人为什么会追求“远方”？文学能不能成为这种情怀的“代餐品”？

谢有顺：年轻人要对自己好一点，要预留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你说的旅行是向外寻找，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条件。除了向外寻找，我们一定要记得向内寻找。向外是一个广阔的远方，向内也是一个幽深的宇宙。年轻人大可以去放肆追求喧哗与热闹，去过漏洞百出却一往无前的人生。当向外寻找无法满足你的时候，“行到水穷处”之余，我们还能“坐看云起时”，内心有一个更伟大而幽深的宇宙在等待着你去探索。有人曾说过，20世纪的小说如果有一个主角的话，这个主角的名字叫作内心。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从巴尔扎克到卡夫卡，文学就已经历从描写广阔的社会生活向探求幽深的内心世界的转变。

羊城晚报：您刚刚提到，年轻人就应该冲动肆意。大家对您的评价都是天才早慧，您有没有过特别少年意气的一面？

谢有顺：我肯定不是什么天才，更没有什么早慧，完全是被生活的锤炼和毒打卷着走。我是一个70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辍学一年多，最后只能在村里办的中学读书。上了大学以后，不论是阅读还是其他方面，我的知识都远不如其他同学。但是我没有荒废大学时光，迅速补上功课，开始写文章。那时家里贫困，我就试着赚稿费补贴生活。靠着赚稿费读大学，这个动力也很真实，我认为它并不比“我要成为一个文学家”庸俗，甚至更具有激励人心的力量。

肆 “我真实地介入过当下的文学”

羊城晚报：您认为文学批评的意义是什么？

谢有顺：文学批评也许是一种速朽的文体，但我至少告诉自己，我真实地介入过当下的文学，我了解当代文学的变化，我懂得一个作家是如何成长的。敢于说出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这是同时代批评家应有的见识和胆识。文学批评参与了当代文学的进程，即使50年后再来写文学史，依然还要参照我们这些批评家所做过的工作，没有同时代人的解读，就没有历史的积累。

羊城晚报：作为知名的文学批评家，您认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发现一部作品里的“好”？

谢有顺：其实就是一个读书方法的问题。横扫一切的否定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对一个宏大命题作出否定判断，不用提供真实的证据。你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很容易，但你能说《透明的红萝卜》《活着》《人面桃花》是“垃圾”吗？这些是公认的好作品。有些人喜欢下一个很宏大的判断，以表现自己敢于批判的姿态，但这种判断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旦还原到具体的个案上就会显得十分可笑。

所以我说，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要勇气，肯定就意味着你要去“发现”。在思想、艺术、美学上发现和确认一部作品的价值是一种能力。这种“发现”取决于我们用何种方法读书。看一本书、一个作家，首先要发现他的优点，再指出他的不足。如果我们只以寻找问题的眼光来读书，怎么会得到书的滋养？

伍 一直在读，比你读了什么更重要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有哪些具体的线索和方法能指导我们阅读呢？

谢有顺：我一直反对快乐阅读的这种说法，如果你过度迷恋快乐阅读，那你的阅读可能永远只在一个平面滑行。真正有收获的阅读，从来都是有难度的。当你啃完一本难啃的书，读懂和读通了一本经典，你的思想和见识有可能就会上一个台阶。有观念和思想创见的书，是不可能完全做到通俗易懂的。

我们永远不能让康德、黑格尔的著述通俗易懂，因为他们的思想契合的是人类精神的“塔尖”。如果你要攀登这座精神之塔，就要倾注大量时间、精力乃至意志。人一生也许不需要读很多书，几百本里有三五十本是你常读的书，我觉得就足够应对这个复杂和艰难的世界了，但问题是我们缺少精读一本书、持续读一本书的耐心。

羊城晚报：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解读人性，我们应该读些什么书？

谢有顺：当你觉得自己无法把握的时候，那就去读经典，经过50年、100年甚至几百年大家还在谈论的那个经典。读书，是要在读书中理解书、在读书中学会读书、在读书中选择书。一直在读，比你读了什么更重要。阅读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你选择你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书开始读起，读你能理解的那部分，等你读得够多的时候，内心就成长、壮大了。这个成长过程就会教你怎么选择书，以及如何更好地阅读，这本身也是一个自我了解、自我探索、自我觉悟的过程。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重估“杨二嫂”

鲁迅小说《故乡》，是一篇感情复杂的小说，叙事者“我”对所面对的人物的态度是复杂的，由此使他对故乡的态度也愈显复杂，而且以决绝的离开为主调，又以离开后的希冀为情感“补救”，显示出“毕竟是故乡”的不忍。

说到人物，自然首先想到闰土，这一形象的确占据着小说的中心位置。但我现在特别想强调另一个人物的独特性，那就是杨二嫂。都说阿Q代表了精神胜利法，闰土代表了麻木。可是杨二嫂这个呼啸而过的人物，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国民性”或许更具生活的“质感”，更加根深蒂固。

我曾经在一篇专门讨论《故乡》的文章里强调过人物的变与不变。小说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前后变化，但事实上真正表达的是他们的不变。年轻时候的杨二嫂，人称豆腐西施，颧骨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圆规似的双腿，简直判若两人。但是鲁迅强调了那个时候，她整天涂脂抹粉，所以掩盖了颧骨，同时又是整天坐在案台的后面，所以也看不见圆规似的腿。但鲁迅难道真的是写一个女性从年轻到中年的蜕变？这个蜕变过程中真正改变的，是做人的姿态和做事的方式。西施时代的杨二嫂，一定还是注重自己的尊严，保持着生意不错的姿态。但是，生活改变了她，使她向流俗的道路上一路下滑。多年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她，完全改变了形象，跟“西施”毫无关系了。

按照出场顺序，杨二嫂表现出如下做派。首先是情感上的强词夺理，“我还抱过你咧”的先声夺人；然后是以抬高对方的手段试图获利，“你阔了”“放了道台”“三房姨太太”，以足够的高帽以图明目张胆地抢劫；最后还有以向“我”的母亲告密闰土偷碗的“立功”自诩，公开抢夺东西。这样一个杨二嫂，如果是在年轻时，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哪一个是本来？哪种状态才是骨子里的？从作者给出的指向，应该是后者。

如果说闰土的直接的“老爷”之呼可能已经绝迹，但是杨二嫂式的表演，是不是仍然有一种熟悉不过的感觉？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无须对“癫”上价值

淘宝举行“年度十大商品”评选，共20个商品入围。这些入围的商品，光看名字就很“癫”：不要脸防晒服、打工人立牌、90%荒诞卫衣、丑鱼拖鞋、太空船票、荧光穿戴甲、捏捏乐、无边抱枕，亮瞎了你的双眼。尤其是那个“一袋垃圾”，本以为“垃圾”只是一种调侃和修辞，让人有意外惊喜。可我仔细看了商品说明，真是一袋包含着棉絮、布条、边角料的垃圾。可就是这“一袋垃圾”，竟然一个月卖出近4000件，累积到现在，售出超过7000多件！一个人癫就够了，竟有一群人跟着一起癫，并且癫到了“十大”。

面对“一袋垃圾”，我不禁陷入沉思：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提醒人们关注环保，或者是有某种更深沉的哲学内涵？惭愧惭愧，我的习惯就是这样，一定要为某个事物找到某种“深刻的意义与价值”，才觉得那东西有了存在的正当性。可让我怀疑人生的是，翻看这袋“垃圾”的评价区，似乎很难找到我熟悉的那种宏大意义。

我突然意识到，那种“上价值”“找意义”的过度阐释习惯，可能正是与这代年轻人产生代沟的地方！癫就是癫，“癫”这种行为，本身就带着一种“反意义阐释”的倔强面孔。一袋垃圾就是“垃圾”，为什么非要去升华拔高它，去彰显它本不具有的品质？过度苛求意义，什么事都追求意义，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重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中学被困在应试的意义系统中，刚进大学又被困到保研考研的意义系统中，走向社会又困于职场KPI考核的意义系统。

我理解，这些看起来很“癫”的商品、“癫”的行为，是年轻人努力挣脱那种“常规的意义系统”的一种尝试，表达一种追求松弛、不自我设限的生活态度。“一袋垃圾”本身没有意义，但在这个商品化互动、行为艺术化游戏的过程中，它给游戏者带来了远超“传统商品价值”的情绪价值：图个乐子，当个段子，顺便拍照发条与众不同的朋友圈，借机下楼扔个垃圾，寄给一个能“接得住”的好友。

●随手拍

翘首以盼

图/文 梅方明

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安徽的一个农村里，老人和留守的孩童在相思树下翘首以盼远方归来的亲人。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陪伴与慰藉

一条长长的街，全都是待售的狗，有的温顺地被关在笼子里，有的安静地被商家抱在怀内，有的认命地被拴在一旁。在这一刻，它们是不具生命力的“物体”，是待价而沽的“商品”。

这儿，是广西南宁的新华街。

我驻足而观，发现趋前问价的人络绎不绝；狗儿售价参差不齐，便宜者数百，价昂者上千、上万。有些商家提供终身售后服务，买卖双方还可签订交易合同，十分专业。

近年来，“民不聊生”这个成语，已经有了一个打趣的诠释——年轻的一代，都不爱聊生育的问题，转而把生活的重点放在豢养宠物上。在南宁的大街小巷，经常可以看到狗狗被打扮得花枝招展，招摇过市。

人们对“毛孩”百般宠溺，出手阔绰，在准备狗粮时，注意营养均衡，讲求口味多样化；此外，智力开发、医疗保健、美容护理、宠物摄影，一样也少不了。闲时，还带它们上宠物餐馆和宠物乐园，缤纷它们的生活。

在公园里，有好些银发族在遛狗，他们可不是为分身乏术的孩子代劳的，是自己养的。

我好奇地问其中一名老者：“你好不容易才盼来悠闲的晚年，干吗还要自讨苦吃地伺候宠物？”她听了直叹气：“孩子还未生养呀，我无法逗孙，自己又没别的嗜好，就养条狗来宠宠啰！”

年轻人养宠物狗，是寻求忠诚的陪伴；老年人呢，却借此慰藉寂寞的心灵。

【夕花朝拾】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鸡叫心烦，鸟叫心欢

广州人喜欢养鸟。1907年《时事画报》上便描绘了广州万寿寺的一次“斗雀”场景，可知广州人养鸟玩鸟历史久矣。但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鸟鸣在民宅之间几乎完全消失，一来养鸟被冠以“走资”的标签，二来生活困难，养人已属不易。彼时人们开始纷纷养鸡，唯求每月多几枚鸡蛋，因此每天早晨鸡啼声便在广州的街头巷尾此起彼伏。

进入80年代后，随着观念改变和生活水平提高，广州人对于鸟的热情又开始洋溢起来，养鸡重新被养鸟替代。在广州富南茶楼，鼎盛时六百个座位间有一半人是带着鸟笼来饮茶，俨然集聚成一个鸟市交易与鸟友交际的中心。广州的养鸟人中男女皆有，老少并存，据1985年广州市海珠区养鸟协会不完全统计，仅海珠区十二万户人家中，养鸟的就有约一万户，可谓大行其道。广州海珠区养鸟协会负责人陈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鸡叫心烦，鸟鸣心欢。如今市民们的鸡笼已换成了鸟笼。”

居民大力参与，官方也不甘落后。1981年6月，广州保护鸟类协会正式成立；1982年，广州市把每年3月20日定为“鸟节”，并举行“爱鸟周”活动，鼓励居民养鸟护鸟；1985年，广州市政府根据群众评议，选定画眉为广州市“市鸟”，并成立了广州市养鸟协会，随后又在流花湖畔建成“流花鸟苑”，并设立专门出售鸟和饲料的摊档。

【有稽之谈】 **谭天**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遇见“新文盲”

在一个大一新生的微信群里，我简直无法跟他们顺畅交流，他们大多用表情包来表达，用文字也只限于单词，很少用完整的句子来表达意思的。难道这些互联网的原住民，在碎片化传播中长大的年轻人，正在或已经丧失文字表达能力了？

有一篇《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的文章列举出当下中文的各种危机：越来越低幼，废话越来越多，越来越失去创造力……其中，我觉得最可恶的是网文表达中的低幼化现象，以幼稚为荣，以蠢萌为美，有些简直是降低人的智商。更可悲的是如文中所描述的，我们生活的时代：歌词越来越口水化，文学越来越网络化，诗歌越来越浅显化，大众词汇越来越庸俗化……

进入互联网时代，可怕的事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变成不能用文字来正确表达思想的“新文盲”。“新文盲”并非不识字，而是不会用文字来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短视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信息易于传播，另一方面可能会减少人们对文字的使用。新技术新应用的发明和应用是好事，但一定要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表情包、短视频和人工智能的滥用，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孩子们的认知和成长。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被疗愈的疼痛

一位作家，在作品里所要解决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可能要经历漫长时间的发酵与思考，才经由某个契机，找到它得以言说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当我看到陈继明的长篇《大声独白》，联想到此前他的长篇《平安批》与《敦煌》，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几部作品，它们的色调差异如此之明显，也许，这个课题应该留给创作学研究者。

在《收获》2025年第1期刊载的《大声独白》，是一个关于疼痛与疗愈的故事。男主李杜从陕西“泾渭分明”这个词语产生的地方，来到广州读医学院，是因为父亲患有顽固的“幻肢痛”，夜夜为早已截掉的胳膊发出痛苦的呻吟。在广州，李杜与美丽的空姐景园坠入爱情，可婚姻只维系了123天，“被”分手的李杜，还被景园送到美国，学习疼痛学与心理学，近距离接触那些劫难过后的幸存者——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挣脱“疼痛”与阴霾；他也参与了对卢旺达幸存者的心理治疗……回国后，他创立了私人心理诊所，第一个病人就是他的父亲。那些传说一般的家族历史，被重新讲述……所有的慢性疼痛都不是孤立的医学事件，李杜医生的治疗途径不是药物，而是深度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生历程，寻找隐秘病因和治疗途径。他的口头禅是：“我是用故事看病的人。”但是，一次，在治疗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时，猝不及防，他遭遇与自己相关的“真相”……

能够被疗愈的疼痛，可能只是冰山一角。